

# 20世纪中国

## 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

郭延  
礼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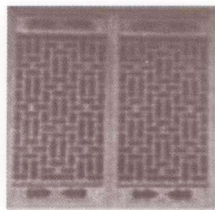


# 20世纪中国

## 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

江西高校出版社

郭延礼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郭延礼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4. 12

ISBN 7-81075-620-6

I. 2… II. 郭 III. 近代文学—文学研究—历史—中国  
IV. 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 第 000794 号

本书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基金项目

20 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 郭延礼著

|      |                               |
|------|-------------------------------|
| 出版发行 | 江西高校出版社                       |
| 社 址  | 江西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
| 邮政编码 | 330046                        |
| 电 话  | (0791)8592235、8511422、8504319 |
| 印 刷  | 江西教育印刷厂                       |
| 照 排  | 江西太元科技有限公司照排部                 |
| 经 销  | 各地书店                          |
| 版次印次 |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 ~ 2000 册                    |
| 开 本  | 787mm × 960mm 1/16            |
| 印 张  | 28.75 印张                      |
| 字 数  | 441 千字                        |
| 定 价  | 35.00 元                       |

# 目 录

|     |                                        |
|-----|----------------------------------------|
| 1   | 绪论                                     |
| 17  | 上篇 20 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
| 21  | 第一章 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1919—1949)              |
| 21  | 一 概说                                   |
| 26  | 二 鲁迅与中国近代文学(附周作人有关近代文学的论述)             |
| 39  | 三 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及其他                    |
| 54  | 四 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         |
| 59  | 五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
| 64  | 六 郑振铎的近代文学研究                           |
| 69  | 七 吴文祺、杨世骥、范烟桥等人的近代文学研究                 |
| 78  | 第二章 近代文学研究的拓展期(1950—1979)              |
| 78  | 一 概说                                   |
| 85  | 二 “近代文学”文学史概念的确立和近代文学史阶段的划分            |
| 90  | 三 阿英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
| 105 | 四 50 与 60 年代之交大学生集体编著的文学史对近代文学的评论      |
| 112 | 五 季镇淮、钱仲联、任访秋、舒芜、陈则光、魏绍昌等人的近代文学研究和资料建设 |

|                                      |     |
|--------------------------------------|-----|
| 六 近代文学研究的荒芜与复苏                       | 138 |
| 第三章 近代文学研究的繁盛期(1980—2000)            | 142 |
| 一 概说                                 | 142 |
| 二 学术队伍的扩大与学科意识的确立                    | 148 |
| 三 研究方向的相对集中及专门研究家的出现                 | 153 |
| 四 多种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出版,标志着近代文学<br>学科建设一次新的飞跃 | 154 |
| 下篇 学术论争与研究的深入                        | 163 |
| 第四章 从“桐城谬种”到总结桐城派的得失                 | 163 |
| 一 桐城派“正统”地位的动摇                       | 163 |
| 二 “五四”时期对桐城派的批判                      | 171 |
| 三 桐城派“逆流”的始末                         | 174 |
| 四 新时期对桐城派的研究                         | 183 |
| 五 严复、林纾并非桐城派作家                       | 192 |
| 第五章 由对林纾的批判到认同他在翻译文学上的<br>贡献         | 203 |
| 一 “五四”前林纾的翻译活动及其与旧文化的冲突              | 204 |
| 二 “五四”前后林纾的逆潮流而动及新文学家对他的<br>批判       | 209 |
| 三 林纾逝世后学界对他的评论及其功过的反思                | 216 |

|     |                                   |
|-----|-----------------------------------|
| 226 | 四 20 世纪后半期林纾研究的新进展(上)             |
| 235 | 五 20 世纪后半期林纾研究的新进展(下)             |
| 245 | 第六章 刘鹗的悲剧命运及对《老残游记》的批判            |
| 246 | 一 鲁迅、胡适等人论刘鹗及《老残游记》               |
| 253 | 二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对刘鹗及《老残游记》的批判(上)  |
| 262 | 三 6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对刘鹗及《老残游记》的再批判(下) |
| 266 | 四 重新回到学术研究的立场                     |
| 275 | 五 从《老残游记》研究的风风雨雨看批评主体的学术品格        |
| 280 | 第七章 学术与政治:60 年代中期关于谴责小说的一场论争      |
| 280 | 一 20 世纪前半期对谴责小说的研究                |
| 283 | 二 50 年代及 60 年代对谴责小说的评论            |
| 286 | 三 60 年代中期对谴责小说的批判                 |
| 295 | 四 如何认识近代谴责小说的思想意义                 |
| 299 | 第八章 梁启超: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             |
| 300 | 一 20—40 年代:经验与卓识                  |
| 303 | 二 50—60 年代:热闹中的寂寞                 |
| 306 | 三 80 年代以来:深入与危机                   |

|                      |     |
|----------------------|-----|
| 第九章 鸳鸯蝴蝶派的世纪沉浮       | 323 |
| 一 鸳鸯蝴蝶派的兴起与新文学家对它的批判 | 324 |
| 二 批判中的理性分析           | 339 |
| 三 由“反动逆流”所引起的反思      | 349 |
| 四 90年代之后对鸳鸯蝴蝶派的深入体认  | 355 |
| 第十章 王国维的文学理论及其学术精神   | 366 |
| 一 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及其学术成就     | 367 |
| 二 王国维的学术精神           | 376 |
| 三 从王国维研究看非学术因素的干扰    | 383 |
| 第十一章 港澳台及海外的近代文学研究   | 403 |
| 一 台湾的近代文学研究          | 404 |
| 二 香港、澳门的近代文学研究       | 421 |
| 三 海外华人学者的近代文学研究      | 430 |
| 引用与参考书目              | 446 |
| 后记                   | 453 |

## 绪论

20 世纪是中华民族告别古老的中国向现代中国迈进的一个世纪,也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探索生存道路、重塑民族形象的一个世纪。20 世纪初,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从此中国社会,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还是文化教育、学术研究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以 20 世纪的学术研究而论,虽然道路坎坷、失误多多,但由于人文背景根本性的置换,它在中国学术史上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以人文科学研究而论,这个巨大的变化,即由传统的古典型研究过渡到科学的现代型的学术研究。其学术范式也由印象式、感悟式、随笔札记式的批评逐渐转变为注重理性、思辨和逻辑的现代批评。这点在文学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20 世纪的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是一个变化最显著也是成就最辉煌的一个世纪。由于现代学人进入文学研究领域,20 世纪的文学研究,从文学观念、学术

范式到研究方法,均与古代学人的研究有了重大的不同,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学术的新时代。即以研究成就而论,近千种中国文学史的出现,数千种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文学的各个子学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成绩斐然。

# —

20 世纪的文学研究,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又遗留下许多的缺憾。之所以如此,它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时代的学术背景,也有人为的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在 20 世纪的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有如下三点。

## (一)唯物史观的确立

对 20 世纪的学术研究在理论上影响最大的就是唯物史观的确立。诚然,在 19 与 20 世纪之交,由严复自西方引入的进化论对学术界也有很大影响,如胡适便曾提出“历史进化的文学观”,谭正璧也写过《中国文学进化史》;但影响更大、意义更深远的还是唯物史观的确立。唯物史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简称。它是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它第一次把社会历史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它是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就著文将唯物史观引入中国,1924 年 5 月出版的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就是运用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任务和作用进行系统阐释的一部史学理论名著,它的问世标志着唯物史观在中国学术界的正式确立。这是 20 世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新的变革和突破的开端。

如果说,李大钊通过宣传和实践奠定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郭沫若则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于 1930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学术研究的拓荒之作。郭沫若明确表示他是继承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历史学界,它对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人文科学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有“范型”的意义。它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比如书中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一文,作者对《诗经》的解读,就有很多不同于传

统诠释的新鲜见解,在《诗经》研究史上也是一次大的突破。此书在史学和文学界影响很大,连鲁迅先生都说郭沫若“有伟大的发现,路子对了,值得大家师法”。<sup>①</sup> 1947年朱自清在《现代人眼中的古代》中又提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他说:“十篇批判,差不多都是对于古代文化的新解释和新评价,差不多都是郭先生的独见。这里用着辩证唯物论,但我们不觉得是公式化。”由此可见唯物史观已渐渐为学人所关注。在文学研究界,也开始出现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气象。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931)、谭丕谟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933)、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39、1943)、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阿英的《晚清小说史》(1937)均可作为这方面的例证。而在学术界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文学研究,那应是50年代之后的事。5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真诚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研究工作中的指导思想,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的历史、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以及文学发展的规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由于研究者机械地、教条地、简单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研究中曾一度产生过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现象。50年代后期,极“左”思潮开始泛滥,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严重地束缚着研究主体的思想走向和认知方式,文学史研究中出现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文学中的“主流”和“逆流”,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等等无视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思想僵化、缺乏具体分析的产物。在60年代中后期,甚至把古代文化完全视为“封、资、修”的东西,这自然是由阶级斗争观点所导致的一个极端。再加上50—70年代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百家争鸣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贯彻,故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文学批评也暴露了它在实践中所造成的弊端:一种观点、一个调子、一种方法,严重地窒息了唯物史观固有的生命力。新时期以来,随着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重新认识,重新研究,恢复了它固有的生命力及其科学地位,仍然成为文学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多维、研究方法的多元、多学科渗透,形成了文学研究多元并存的总态势。看来,多维度、多视角、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sup>①</sup>转引自《新华日报》资料室编:《悼念郭老》,三联书店1979年版。

是形成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 (二)西方文化的影响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明显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具体到文学研究来说,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西方文化对文学观念的影响。19 世纪末,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此书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影响很大,同时进化论也影响到文学观念,于是人们开始以进化论的观念研究文学,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刘贞晦的《中国文学变迁史》,从书名均可看出进化论文学观的影响,此其一。受西方文学观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杂文学观念受到挑战,研究者开始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作为文学结构的主要样式,这便有了纯文学观的概念。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金受申的《中国纯文学史》等书,便是这种观念的产物。此其二。“五四”后,确立了白话文学的正宗地位,提升了俗文学的价值,重视小说和戏剧,张扬女性文学,均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体现。以近代文学研究而论,最受研究者关注的就是小说和戏剧(二者在近代都属于通俗文学),这与小说、戏剧在近代由文学的边缘向中心转移有关。而这种位移,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外部形式的变化,实际上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研究主体文学观念转变的一种体现。在 20 世纪初期,王国维致力于中国戏曲史的研究;20 年代,鲁迅致力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都是研究主体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反映。与此前后,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及关于近代小说的考证、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卢冀野的《中国戏剧概论》、杨世骥的《文苑谈往》,均把小说和戏剧作为近代文学研究的重心。研究主体的这种新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此外,在近代文学研究中,研究主体对翻译文学的关注,更可以明显地透视出西方文学在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地位。我上面所提到的胡适、陈子展、杨世骥、阿英等人在其相关著作中,均有专章或专节论述近代翻译文学。这都充分表明,在西方文化影响下所产生的新的文学观念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导向作用。此其三。以上三点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影响。

其次,西方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译介和吸取外国美学、文学理论

方面<sup>①</sup>。20世纪初,学界就开始译介德国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文学、美学理论;“五四”之后,又译介俄国高尔基等人的文学理论;30年代之后,还介绍了外国著名文学史学家如泰纳、朗宋、勃兰兑斯等人的理论。50—60年代,着重介绍了俄国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以及前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等,这是50—60年代读过大学中文系的人所十分熟悉的。80年代之后,西方文化思潮一开始就是中国现代新启蒙的重要理论资源和话语参照,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日益发展,现代西方的哲学观念、美学、文学理论不断进入中国。什么原型理论、阐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派,这些新的理论不仅对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是一种猛烈的冲击,而且对中国新的文论建构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三,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东渐”,也引发了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方法的更新,首先是思想观念的更新。从世纪初,一些曾留学或旅居外国的学者,在西方文化的启示下,便致力方法的更新。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最早引入西方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的思维方法,并与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建构了新的文学批评范式,后来胡适等人又引入了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他由此并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证方法,在20—40年代的学术界影响很大。

除了实证的科学方法外,一些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根据研究客体的需要,也采用其他多种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心理学、比较文学的方法,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郑振铎、钱钟书、朱光潜等学者,运用这些方法在文学研究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80年代之后,“欧风美雨”又一次进入中国大地,从借鉴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开始,中国学人对改变旧有的、单一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更新观念,寻求、借鉴、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成为学人自觉的追求。于是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新的方法热,什么心理学研究法、符号学研究法、原型批评研究法、接受美学研究法、文化批评研究法等等,大多是从西方译介过来的。这些新的

<sup>①</sup>中国近现代文学创作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已是人所共见。因不属于本书研究范围,这里不谈。

研究方法不仅使研究主体开阔了视野,拓展了研究空间,开拓了许多新的思路,而且也大大冲击了“唯认识论”、“唯社会学”的思维模式和批评方式。在文学研究中形成了多维度、多视角、多元并存的研究格局。80年代之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出现了这么多新的、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与借鉴、吸取、运用这些新方法有很大的关系。

### (三)意识形态(政治因素)的干扰

20 世纪学术研究受到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意识形态(政治因素)的干扰,特别是 50 年代至 70 年代,它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而且也阻碍了人文学科大师级学者的出现。我们仍以文学研究为例。

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它和社会、政治是有关联的,但文学又有其审美的特殊性,它和一般的意识形态诸如哲学、宗教、道德、法律是有区别的。因此,文学研究固不能说与政治毫无关系,但它有自己的宗旨和职能,不可与政治联系得过于紧密。50 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学术领域的“兴无灭资”(接连不断的思想批判和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的泛滥,又将“政治标准第一”替换成“政治标准唯一”,此后的学术研究中政治的干扰更加突出。

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而论,50 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上述的政治背景,学界不仅将近代文学分成“新派”和“旧派”(或称“复古派”、“形式主义派”),并对“旧派”如桐城派、宋诗派、同光体、鸳鸯蝴蝶派(以下简称为“鸳蝴派”)文学全盘否定,说成是反现实主义的逆流;而且又对一向视为具有进步倾向的谴责小说大肆讨伐。其理论根据就是近代四大谴责小说的作者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而在清末所出现的这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后日趋反动,它对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只能起着反对和抵制的作用,毫无进步性可言,故《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这类谴责小说其政治倾向都是反动的,都是抵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我们姑且不说把作家的政治态度完全等同于作品思想意义是如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就这种形式主义推论的武断性而言,已令人难以认同。就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推论和极“左”思潮的上纲上线,在文学研究界愈演愈烈,至“文革”已达登峰造极的程度。“文革”中近代文学研究一片空白,几近于零。在“评法批儒”

中出现的少数所谓评论文章,又成为政治野心家篡党夺权的工具,自然与学术研究毫不相干。

意识形态的干扰在近代文学研究中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除上面谈到的外,还有如下几点:

第一,关于“禁区”的问题。由于曾国藩曾镇压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这一政治上的污点严重地影响了 50 年代之后对他的文学活动的研究和评价。曾国藩作为近代桐城派的领袖,对近代桐城派的“中兴”和桐城古文理论建设方面都是有贡献的,但直到 80 年代中期,学术界仍将曾国藩与桐城派的关系及曾氏的文论视为“禁区”,很少有人敢越雷池一步。

第二,以作家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为批评标准。比如 50 年代初对于黄遵宪诗歌的评论就是一例。有的学者认为在黄遵宪早年的诗中有敌视太平天国革命的诗,并对义和团的封建迷信也持怀疑态度,且不同情义和团等等,以此便认为黄遵宪不能称为进步的诗人。同样的例子还有诗人金和。金和是近代一位有成就的讽刺诗人,尤其是他的几首长篇叙事诗《兰陵女儿行》、《烈女行纪黄婉梨事》、《断指生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具有丰富的思想意蕴和相当高的讽刺艺术。他还写有深刻揭露清王朝军队腐败、残害人民罪行的讽刺诗,其讽刺艺术技巧很有特色,在近代诗歌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即使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sup>①</sup>的标准来衡量,金和的讽刺诗也可以站得住脚的。只是由于金和前期在政治上反对太平天国,所以在 50—60 年代诸多文学史中金和的诗歌受到了批判。

第三,以政治事件单纯的时间标志为界划定作家文学创作的进步与反动,突出的例子是對待康有为的诗歌。50 年代末,有人提出,对于康有为在文学上的成就,应该同他所倡导和推行的改良主义变法运动结合起来看。首先把他进步时期的作品同他反动时期的作品区别开来。对于康有为进步时期的作品,基本上应该肯定,而对于康有为“戊戌政变”之后的作品则应当批判。其实,文学创作并没有这么机械。如

<sup>①</sup>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69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所周知,“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亡海外,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的诗篇,这些海外诗,有的描写异国的自然风光、风土民情,也有的记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发明和艺术成就,还有的反映资本主义国家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特别值得珍视的,是他的海外诗中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按照以“戊戌政变”为界区分他诗歌的进步与反动,那他的这些海外诗篇均被排斥在他的诗歌创作之外。显然,这样就很难全面地、正确地评价康有为诗歌创作的成就。可见以政治事件(单纯的时间)划线来区分作家文学作品的进步与反动是不科学的。类此的例子还有梁启超。如果对梁启超也按照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来划线的话,那么 1898 年之后,恰恰正是梁启超发动“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的黄金时代,也是奠定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作为文学革新运动主将地位的中丽天日之时,更不用说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对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政治、文学等方面的贡献了。可见以简单的政治事件或作家的政治态度来划线是不科学的。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作家的世界观也不能代替创作方法。“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sup>①</sup> 50—60 年代在近代文学研究中的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教条主义、简单化、极“左”思潮等非学术因素对研究工作的干扰是相当严重的,其后果也是令人痛心的。

## 二

中国近代文学的下限是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尽管在“五四”前也有对近代文学的研究,我还是把近代文学研究的起点定在“五四”,因为真正的研究工作还是在“五四”之后,这样它的研究时限在 20 世纪也就只有八十年(1919—2000)。在这八十年中,依据它的发展进程,我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到 1949 年为第一阶段,称之为开创期;从 50 年代到 1979 年为第二阶段,称之为“拓展期”;从 1980 年到 2000 年为第三阶段,称之为繁盛期。

<sup>①</sup>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74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是全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最薄弱的一环,长期处于一种弱势状态。它不同于古代文学,它没有古代文学长期的研究历史和文献资料积累,它也不能与现当代文学攀比,它没有现当代文学那样显赫的地位和庞大的研究队伍。但中国近代文学也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首先,近代文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如所周知,中国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它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中国近代文学又是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的转型期,它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具有由旧到新的“中介”性(过渡性)的特点。“五四”之后的现代文学是近代文学创造性的发展和超越,但它的源头是在近代。这个问题已越来越为更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历史联系十分密切,这在如下几个问题上看得十分清楚。一是近代文学的主题: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或称反帝反封建),仍是现代文学继续描写和深化的主题。二是近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是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前奏。梁启超等人的“开启民智”、“改良群治”和“新民说”是“五四”时期鲁迅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和文学研究会所倡导的“为人生的文学”的先导。二者均基于启蒙主义。思想启蒙是近现代文学家共同的使命。三是近代文学革新运动(包括四大文体革命和白话文热潮)揭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奠定了“五四”白话文学的理论基础。近代文学的形式革新走向和“五四”新文学的走向是一致的。四是近代文学对现代文学先驱者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五是现代文学的先驱者大多在近代已开始了文学活动,如鲁迅、胡适、周作人、陈独秀、叶圣陶、刘半农、蔡元培、伍光建等人。六是近代文学在吸取西方文化和借鉴西方文学的艺术技巧方面,为“五四”创造性地学习西方文学、开创一代文学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以上这些问题都具有从宏观的角度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价值。

其次,近代文学有丰富的文学资源亟待开发。中国近代文学创作繁花似锦、绚丽多姿。我们姑且不谈它是在中西文化撞击下所产生的具有新的文学观念、新的创作主题、新的美学风格、新的文学技巧、新的艺术形式、新的传播媒介的一种开放型的文学,仅就数量而言,就是一宗十分宝贵的财富。据粗略的、保守的统计,近代有诗人两千家,诗作当以十万首计;中长篇小说千余种,短篇小说数千篇,戏剧近千种,另有

翻译文学数千种<sup>①</sup>,在这些遗产中,许多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至 20 世纪末,真正作过较深入研究的近代作家不超过 50 家。以小说为例,近代有中长篇小说千余种,而真正作过深入研究的,除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四大家外,近年来又有黄世仲、陆士谔、徐枕亚、李定夷、李涵秋、包天笑等人,加起来也就是十余人,所涉及的作品不足百种,如果和近代小说的出版数量相较,那实在是距离太大了<sup>②</sup>。至于近代诗歌、近代散文、近代戏剧、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如近代小说(近代诗歌研究稍好一点)。丰富的近代文学资源,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预示着近代文学研究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 三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在全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虽然是最薄弱的一环,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已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的研究力量、研究成果和独立学科格局的阵容。

第一,成立了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国家一级学会),国家社会科学规划把“近代文学”明确定为二级学科。这都为近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了交流研究成果、协调研究计划,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中国近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即年会),至 2000 年已召开了 10 次。年会之外,学会理事协同各省市的分会还举办了四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即“首届中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1 年·上海)、“刘鹗与《老残游记》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 年·济南)、“中国近代文学与海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 年·澳门)、“上海近代小说与陆士谔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 年·上海)”,以及以近代文学为主题的各种学术讨论会十余次。这些学术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此外,还出版了几种近代文学研究刊物,如中山大学中文系编辑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1983—1985)、张正吾主编的《晚清民国文学研究集刊》(1995—199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室编的《近

<sup>①</sup> 详见拙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绪论》和《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sup>②</sup> 据日本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统计,近代有创作小说 7466 种,翻译小说 2454 种,合计为 10011 种。